

“万岁”非正常死亡别有隐情

寨 存 耆

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①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

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②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

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多。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

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父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

^① 内务府：清代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掌管宫廷内的祭礼、财务、警卫、刑狱等事务。

^② “知会”：通知。

叔父也说：“上头欠安 若是重的话 还不‘发抄’^①吗？”

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②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③我的姑丈，内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 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④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⑤医士“终日不得闲”。^⑥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士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

① “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 通报各处。

②③ ⑤⑥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国事？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下，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久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的，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了，也有些明白。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于是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熬白菜”^①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②，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們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辞，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

^① “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

^② “票了”：喻无所不得。

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即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有什么，就觉得疲盛，叫大夫想法子去去疲。’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

过了“百日”后，从宫中发给具有得到所谓“颁赏遗念”资格的王公、大臣、懿亲、勋旧一批纪念物品，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褂”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我父亲所得“遗念”中有一件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在我看来，就非常奇怪：

上半截是小紧毛的羊皮，下半截是黑山羊皮，非紫羔皮。若照封建时代的实况来讲，这种两截皮袍根本不该是一个封建皇帝所用的，皮上身是小紧毛，御寒还不如一件厚棉袄。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还硬要说“德宗”生平最喜好穿两截皮衣。后来听说光绪所住的屋子，冬天并不暖和，而且在光绪亲祭“坛庙”的时候，谁都看见光绪的鼻子下头总是挂着两条清鼻涕，他并不擦拭。“清鼻涕”与“小紧毛”当是有关联的了。

除了穿不暖，就是吃不饱了。在封建社会里，吃得多就得被说成是“胆大而多嘴了”。据太监们说，光绪吃饭，只有摆在眼前的几样菜食是新做出的，其余的俱和祭祀上供一样。初一搭上“膳桌”的菜食，可能到十五还是这些，所以光绪一吃饭就闹气。

再说到他的独身生活，更是凄惨。我的一位叔父（增绂，内务府员外郎）常在带“匠”（给光绪的住所换纱窗的裱匠和木匠）的时候，到太监的屋里休息，常常听到他们说点闲话。有一次，我那位叔父向一个太监说：“咱们‘老爷子’（光绪）总这样一个人，他寂寞不寂寞呀？”那个太监说：“别提啦。我们‘上夜’（夜间在光绪住的房里守更）的时候，有时就听见老爷子叫‘小珍儿，小珍儿’的，还有什么‘小宝贝儿’……”那个太监说着，脸上也很凄惨。

关于光绪突然身故，还有一说。说是西太后曾经说过：“谁要叫我不称心，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称心。”这本是在戊戌以后尽人皆知的话。另一句话就是西太后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这句话在几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后来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叶景莘

外交委员会的产生和结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员会：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 1918 年 12 月中旬成立的，设于徐世昌总统府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尔赛和约而于 1919 年 5 月 3 日自行结束。第二个大约是在 1923 年初黎元洪任张绍曾组阁时设立的，委员长为黄郛，我是委员。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约是在 1925 年段祺瑞执政时或较早些时设立的，委员长为汪大燮。他的惟一任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约的委员编一部不平等条约类编，将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编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参考。这是他的宿愿。类编印出后，会即结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员会。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员会的事情。1918 年 10 月徐世昌就任总统，11 月 11 日日欧战停止，12 月 1 日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出国赴巴黎和会。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谈，离日上船时就发现丢了一个公事

箱。国内舆论本认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四条约》者，颇为不满。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篆代行部务。他资历甚浅，声望不高，一般人都认为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设一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采纳了，并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輿、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篆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徐世昌原是个极圆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顾问。林劝他请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了。这个外交委员会设在紫光阁西南角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内，但与府的办公处隔离较远。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们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采取敷衍的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来电确是抄送给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讨论审查，于1919年1月6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午后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25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 8 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18 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员会的提议：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王、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荷公使魏宸组。汪看了这个名次甚为踌躇，因为和会只给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轮流出席，怕有时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 3 人出席，则应为前 3 人，但陆无甚能力，王亦尚无外交经验，且对和会须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何，施则为怕多事的官僚，向不活动，这 3 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林相商不决，我建议只好把顾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顾来电最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驻英公使打来的，施并无一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顾所写的英文声明书颇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涉的经过。汪采纳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请徐核定。徐同意了。汪、林回会，通知陈箴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发。陈拿这个名单出门时，低声说：“这是要捣乱了。”果然，新名单到专使处，王、施大哗，陆窘极。他到瑞士去躲避，此事即为一原因。但以后在和会上为中国辩论，确以顾为最力，并最能说。

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大纲里“统一铁路管理”一项引起了大争论。提案原文为：

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 1 月 8 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千方百计图谋设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后训令，仅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中铁路统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页 169-170）。

丙、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

这个提案的主要目标原是为收回以外资建筑、为势力范围骨于的东清、南满、安奉、胶济、滇越各路。因为国家无此实力，故欲统一管理之，又因无赎回之财力，故欲将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而以铁路收入还清。但以外债建筑的如津浦、沪杭、京汉等各路亦与势力范围有关，如不包括于统一管理之内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据有以外资建筑各路的各国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偿清总债而亦难于举一总债，因此欲将外资、外债建造各路一概统一之。

外交委员会提案于 1 月 8 日电各专使。约一个月后 因中国代表在巴黎要发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协定，日使小幡于 2 月 2 日到外交部抗议，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出反对铁路统一的社论。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声明对于统一铁路案尚待研究，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舆亦称彼在会本不赞成。先是，称为旧交通系领袖的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是共管。那时交通部顾问贝克和中英公司经理梅尔思各拟有“万国铁路团”私案，是共管性质，反对者即以此种拟案与外交委员会提案并论。

2 月 18 日钱能训约赞否两方集于春藕斋。汪、熊声明提案与贝克、梅尔思拟案无关，最后梁亦表示赞成之意。钱声明双方无根本不同之意见，办法应再详议。汪推曹、梁拟案。3 月 7 日国务院召集春藕斋第二次会议，曹、梁提出破坏原提案的草案，林长民因双方争持不下，拟了一个妥协办法。汪不同意，会后即辞职不复到外交委员会。

平心论之，委员会提案中所举借总债及延用外国专家辅助经理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实际情形不能避免，并非共管性质，但以后是否会流于共管，确应考虑。举总债时如何方可不受新银行团的压迫，更是问题。熊希龄以为此等皆系商订条件时所当注意，但政局多变，商订条件者为谁，亦难保证。另一方面，破除势力范围单靠要求，无此实力；但不破除则势将引入瓜分，提案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用意在于破除势力范围，并非为私，他们提出由交通部指挥，而当时他们在交通界并无一个立足之点。梁士诒提出已成外债各路不在统一计划之内，有保持他由于管理和调运铁路收入而来的“财神”头衔之嫌疑。曹汝霖在《顺天时报》反对后出场，陆宗輿在第一次春藕斋会议时，竟为高徐、济顺两路辩护是商业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则简直是与日本“一鼻孔出气”了。这是赞否两方主要不同之点。徐、钱则以圆滑手段依违两可于其间，而终偏向亲日派。曹、陆被称为亲日派，汪、熊、林等则被称为亲英美派。

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十四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可说是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用形势和对方面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中国利权，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水”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

(1) 债权国权限只能及于投资确实，本利有着，其他不能过问；(2) 执行之权完全归中国政府，他国不得过问；(3) 为使资本家安心起见，可设立评议部，以便稽核或建议改良。其中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铁路收入常被任意挪用亏欠而提出的。林长民曾刊印一本《铁路统一问题》，以披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诒曾表示应当保存势力范围而“赖均势以求存”，他的机关报也发出了这种言论。当时我曾写了一本《撤废势力范围论》小册子送各处以辟之。

汪大燮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徐世昌屡次慰留，亦不肯回会。以后和会对中国形势日恶。日本原已在 1917 年 2 月至 3 月与英、法、俄、意订立了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的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英代表劳合·乔治亦宣称日本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则已因阜姆港问题不遂意而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让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纷来，林长民乃亲到汤山恳汪回会视事。

4 月 30 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5 月 1 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呈亲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 2 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3 日凌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

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3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 10 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 3 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 3 人。

5月4日当天学生被捕 32 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十余人，并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 30 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

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三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他们进厅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 100 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要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下午四点钟回石虎胡同而散。

5月8日，北洋政府又颁布弹压学生命令。6月3日北京学生讲演，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继起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陆、章等。6月10日徐世昌咨两院辞职，但仍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签约。28日签约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鲠生先生也是前往者之一。本来各专使并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愿签约。陆征祥实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常批评他不过是个“大礼官的材料”。他也许会迫于政府命令去签，如袁世凯命他签《民四条约》一样，但亦不能与曹、章一概而论。其他专使都是精明机警之人，即使专为个人着想，亦未必

肯负这个签约的责任，来蹈曹、章的覆辙。当时各处电专使拒签的电文有极严厉的。那时陆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和我是副总干事，我们于 3 日以 3 人名义电陆勿签。我起的电稿最末说“如签 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专使们敢犯众怒吗？专使寓所既被包围，于是不去凡尔赛签约而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历述中国代表团的苦心：如 4 月 4 日对和会的抗议，5 月 6 日关于山东条文保留的提议，5 月 26 日在保留条件下签约的正式通知 并举出 1815 年 6 月 9 日维也纳条约签字时瑞典代表保留三个条文而签约的前例，以驳斥保留无前例之说；以后中国代表又提出将保留条件作为和约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尔赛签约前送一保留山东条文的声明，而和会主席只允在签字后送去；代表团以签字后的声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声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此，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① 这个声明是否预先拟好的，不得而知。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

见麦克莫雷：《与中国订立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1496 页。

一波三折、无疾而终的南北 弭兵会议 ”

叶恭绰

辛亥革命时，曾在南京举行南北议和，南方代理以伍廷芳为首，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和议成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临时大总统孙文退位，袁世凯当选为第一届大总统。自此以后，南北之争，始终未断，中间又经过民国二年的癸丑之战、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主持的复辟等几次巨大政变。迨 1917 年（民国六年）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后，其时北方府院之争，暗中也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之争日形激烈；而南方组织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于是南北之间的斗争愈形复杂。当此之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客暗争，外加以帝国主义的明侵暗蚀，推波助澜，真是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国敝民贫已达极点。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上表面出现了和平空气，国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以纾民困，而图争取国际上之地位。在此之前，南北军阀派系之间，亦不断有谈和之声浪，但双方迄未获得较接近之机会。嗣因国内外和平空气之高涨，南北执政首脑以及各实力派均希望借此时机提出和平口号，解决当时所存在之问题。虽然免不了各为其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来作打算，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如安福系的一些人，仍坚决主张以武力统一，但却不欲公然提出反对和

平，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徐世昌于 1918 年 9 月为安福系所操纵的第二届国会选出为大总统，首先他就进行南北和谈之准备。此时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主席岑春煊亦积极要与北方拉拢，于是把酝酿已久的和谈更推进一步，双方派出代表，至 1919 年 2 月始获得正式开会。

这次会议自事先之磋商筹备，及会议中间之波折，真是迂回曲折，艰难困阻，终至于昙花一现，无疾而终，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只是在旧的腐朽政治历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页而已。然而此次会议所牵连之国内外方面乃是千丝万缕，对于以后所发生的影响亦不为小。今加以记述，聊为史料之助，似亦不失为有意义之举。我所能参考到的资料，主要是就当时与会者朱启铃（北方总代表）、章士钊（南方分代表）两先生的谈话，加以演绎编述。因为我当南北和谈之时已出国赴欧洲，当时真相隔膜，现所能参阅到的材料亦不够完整。朱章二先生现时皆已高年，回忆旧事，容或有恍惚之处，故本文所载难免错漏，尚希阅者是正或予补充。^①

会 议 的 经 过

1918 年 9 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继冯国璋执掌政权 欲趁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声誉，来巩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希图借此摆脱各军阀的挟制。他与南方的岑春煊皆属前清之督抚，有同僚的关系，与唐绍仪更有悠久的友谊。而南方军政府亦同样希望利用时机，与徐进行

南北议和档案，仅参考到北方的；南方是否有档案，不可得知，故本文所记多偏于北。另外，朱启铃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南北和议事》及章士钊先生写了一篇《我之上海会议观》，附于本文之尾，就其所记乃系当时内幕，非身历者不能道及，对本文辅助甚大，附此志谢